

10.06

江都文史資料選編

第三輯

86



34164114
江都文史资料选编

第三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
江都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
一九八六年五月



邵伯铁牛

邵伯铁牛铸置于康熙四十年。

据《甘棠小志》记载：“邵伯更楼康熙三十八年六月冲决，长五十六丈五尺，水深四丈，难堵塞。三十九年，鹏翮恭奉圣谕，下埽堵塞，克月成功。四十年，置铁犀一座镇之。”牛腹上刻有铭词：“淮水北来河泱泱，长堤如虹巩如汤，冶铁作犀镇甘棠，以坤制坎柔克刚，容民畜众保无疆，亿万千年颂平康。”

铁牛铸成，置于运河大墩上，并未能镇住甘棠（即邵伯），水患不断。民国二十年大水，邵伯被淹，里下河尽成泽国。

铁牛身长一米七，高七十公分，翘首凝望，作俯伏状，年深日久，经人手摸抚，明亮发光。十年内乱，许多文物遭砸，而铁牛在十六名搬运工人保护下，运至邵伯文化站内。如今铁牛安然无恙，引起许多中外游人心驰神往。



小紀真武廟大殿

江都文史资料选编第三辑目录

图一：邵伯铁牛

图二：小纪真武庙大殿

斗 争 烽 火

- 一、江都屯农两次抗租暴动……………戴 萍 (1)
二、苏中兵工厂忆实……………孔祥宏 (5)
三、对李明扬约法三章……………金益成口述
朱家宽整理 (12)
四、香口战役的回忆……………王清维 (14)

民 族 灾 难

- 五、日寇在余家坂的暴行……………余广虎 (17)
六、汤家庄的一次劫难……………汤志安
邱玉田 (19)

政 权 机 构

- 七、国民党江都县政权机构和人事情况……………杜明甫 (21)

教 育 巡 礼

- 八、文化教育工作巡回团活动纪实……………娄 彬口述
张允生整理 (30)
九、回忆江都县巡回教育团……………颜成璧 (34)

- 十、抗战时期江都河南地区教育概况……张应天 (36)
- 十一、麻村区的教抗会和儿童团……戚 敏 (45)

地方经济

- 十二、帝国主义在仙女庙的经济侵略……………管希宁 (51)
- 十三、仙女庙土特产蛤蟆酥……………管希宁 (56)

人物軼事

- 十四、清末进士严绍曾……………桐江客 朱 岩 (59)
- 十五、我所见到的清末状元张謇……………于顺兴口述
张允生整理 (63)
- 十六、韩紫石先生二三事……………陈明伦 (65)
- 十七、金石、微雕家吴南愚……………韩家裕 (68)
- 十八、我所知道的董干臣……………杨 谷 (70)

乡土风情

- 十九、刻经处概况……………陈明伦 (74)
- 二十、小纪真武庙大殿……………周平 陈明义 (77)
- 二十一、忆“五帮会馆”……………姜锦文 (80)
- 二十二、宜尉投子寺……………凌 露 (83)
- 二十三、回忆大桥镇中山纪念堂……………陈德康 (86)

帮会遗闻

- 二十四、平民乡大刀会忠禄堂片断……………蒋厚安(90)
- 二十五、封建道会门在我县的流布情况……………孙贤志(95)
- 对《大桥商抗会及旧商会》一文的商榷……………振中(118)
- 更正……………(119)

江都屯农两次抗租暴动

戴 萍

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，江都农民和全国农民一样，他们没有土地，或者只有很少贫瘠的土地，虽成年累月地劳动着，但还是生活在苦海里。到了一九一五年，袁世凯称帝前后，各派军阀割据，中国内战频仍，广大农民更加遭殃，不仅要承受各种苛捐杂税，而且要承受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，这就迫使农民起来进行斗争。江都屯农的两次暴动就是典型的例证。

江都屯农第一次抗租斗争发生在一九一六年阴历正月十三，塘头、郭村、宜陵、麾村、七里、砖桥等七十二个村庄零三个舍的屯农，喝齐心酒，举行有几千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抗租暴动。情况是这样：

当时江都县境内，有一种屯田，也叫军田。凡租种这种田的农民就称屯农，他们交的田租比租种一般地主的低，每亩只收200文钱，名义上平时用作军饷，战时用作兵马的粮草，实际上却被地主官僚中饱私囊。江都从塘头公社的彭家庄向西向北，一直到砖桥、丁沟一带都有军田。如：赵家营、黄家营、阎家营、马家营、顾家营、薛家营、韩家营等都是当时军田的居民点。这些田由执政的反动统治者包给有权有势的地主豪绅来管理，称为屯田总管。屯田总管再把田分给他的心腹来分管，这就出现了二地主。

塘头公社的彭家庄住着150户左右人家，有三户地主，其中有个叫吴伯湖的，为人手毒心狠。一九一五年，他勾结居住在宜陵的儿女亲家，买通了县长姚希斋（按县志记载，当时的县长是周光熊），以县政府的名义任命吴伯湖负责收彭家庄一带军田的租税。贪婪的吴伯湖对此早已垂涎三尺，一旦权力到手，立即把上万亩的军田改收一亩田六斗粮，上熟收麦子三斗，下熟收豆子三斗。他凭借管理屯田的权利，残酷地吮吸农民的血汗。朴实善良、安分守己的屯农，虽心中气愤，但没有办法，只好咬紧牙关，忍受了下来。哪里知道吴伯湖得寸进尺，不久又要提高租子，规定一亩田一熟要缴七斗粮。这时屯农们烈火燃胸膛，再也无法忍受了，彭家庄的屯农便自发地团结起来，抗租不缴。这一行动震动了县衙门，反动县长随即派了两个差役到彭家庄，抓走了参加抗租的老实屯农彭福礼，想来个杀鸡吓猴。这一下，更激起了彭家庄及周围群众的愤怒，纷纷要找吴伯湖算帐，因而事态不断扩大，一直影响到砖桥、丁沟一带种军田的农民。广大的屯农以马家营的范得义，彭家庄的王三瘪嘴、庄墩豪、贾德志和现在塘头永和大队的王永喜为首，组织了七十二庄零三舍的屯农参加抗租暴动。一九一六年正月十三上午，四面八方的几千屯农，带着钉钯、铁钩赶到阎家营集中。他们先吃“齐心酒”，后在下午二时许浩浩荡荡地敲着锣，喊着口号，直奔彭家庄的吴伯湖家，其势如暴风骤雨。不到两小时，吴家百十间住房、店堂都被扒掉，家具被摔坏，大米、面谷浇上火油，咸鱼、咸肉、咸鸡、咸鸭全被摔到粪坑里、河里，门前大河里浮了一层，没有一个屯农私自拿了回家。在一片混乱中，吴家大小人等狼狈逃窜，屯农们只抓住了吴伯湖五六岁的孙子吴育成，屯农们就以吴育成作为放出彭福礼的人质。

狗地主吴伯湖虽对屯农恨得咬牙切齿，但又无可奈何，只好买通县衙门，释放彭家福，换回小孙子。吴伯湖再也不敢提高军田租子了，首次抗暴斗争就以地主的失败屯农的胜利结束。从这次抗暴中，受苦的农民看到了自身的力量，摸索到了对付地主的方法。

事隔十年，在一九二六年的秋冬之际，另一个总管彭家庄军田的大地主樊濒（家住扬州城，当时任省议员），他物色了两个承包屯田的头子——薛家营的张龙海、顾金林。两个人一上任就迫不及待地打起收刮屯农的主意，在上缴钱粮单上写着：“折票换租”四个字，票子不要了，改缴租子。农民们一看就知道他的鬼胎，人人气愤。于是住在通扬运河北岸的杨家桥、七里甸、薛家营、杨家营、彭家庄上千屯农通过串联，团结起来，又爆发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抗租风暴。他们捣毁了薛家营屯田总管张龙海、顾金林两家的六间房子。事后，张、顾狗急跳墙，串通扬州衙门，由樊濒率领一百多反动武装到薛家营镇压，并抓走了为顾恒松看大门的姜朝柱和顾恒美、顾恒源、顾恒祥等八个农民。直到北伐军占领了扬州城，因国民党内左派人士出来干预，八个农民才被释放出狱。樊濒等人怀恨在心，到一九二七年九月，也就是“四·一二”事变以后，樊濒趁其外孙王兆俊、王兆杰兄弟在江都县党部做事之便，伙同国民党县长程南轩第二次拘捕屯农八代表。后经人多方面向程南轩交涉，八人才被释放。此后屯农们继续进行合法斗争，他们拼凑粮食，筹集资金，上下买通，官司一直打倒苏州衙门。苏州衙门五天开审两庭，裁决了张龙海、顾金林两人的罪行。张龙海不服，又到江都衙门翻案，江都衙门捉拿了张龙海，押送到苏州监狱，后来死在狱中。第二次抗租暴动又取得了胜利。

这两次农民暴动，揭开了我江都近代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农民斗争的序幕，推动了历史的前进。

苏中兵工厂忆实

孔祥宏

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，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。十二月中、下旬，我军发动江高战役，七纵奉命攻打邵伯镇，日伪军尚固守西导淮碉堡内，而国民党部队又前来增援，企图重占邵伯。为了打退敌人援兵，消灭西导淮敌人，我军奋勇保卫邵伯。在这场战斗中，虽消灭了大批敌人，但我军的伤亡也不少。当时如果手榴弹充足，我军伤亡会少些。邵伯是苏中、苏北的南大门，邵伯解放后，由苏中四团戍守，并建立邵伯特别市，直属苏中领导，杨祖彤同志任市长。粟裕同志从邵伯保卫战得出经验教训，决定由杨祖彤同志负责把苏中四团、五团的修枪所“苏中第八中队”（以下简称八中队），改为生产手榴弹的兵工厂。

为了找个隐蔽、安全的厂址，杨祖彤同志在江都县委的支持下，亲自察看地形，最后选定真武区惠隆乡的邵家庄。这个村庄位于根据地东北方向，地点偏僻，比较安全。东而虽有永安镇大悲寺少数伪军与樊川镇伪军的威胁，但这两处伪军战斗力很差，平时龟缩在碉堡内不敢出镇。万一敌人妄图西犯，邵家庄外围有部队狙击掩护，“八中队”本身亦有自卫反击能力。这个村庄外面有南北大河和东西大小河流阻隔，向西有深水小河沟通纵横如网的大小河流，可驶入根据地中心，只要三四十分钟就可以全部撤出险地。至于这个庄

上的老百姓，几乎都是苦大仇深的穷苦农民，群众易于发动，能够帮助掩护。所有这些，都是设厂的有利条件。

一九四五年隆冬的一天，三十多人的“八中队”进驻邵家庄，一面着手筹备手榴弹生产，一面仍为苏中四团、五团修理枪枝。

“八中队”中队长陈庆桐同志，兴化县人，三十岁上下，个子不高，身体强壮结实，双目炯炯，气宇轩昂，懂得制造炸弹的技术。据他本人说，打兴化城昭阳镇时当副排长，富有作战经验。指导员由真武区副区长韩珍兼任（北撤后叛变革命）。

江都县委在动员新兵入伍时，选送了一批铸造兵，车旋兵充实“八中队”。邵伯保卫战缴获的军需物资，一部分拨归“八中队”，这时“八中队”已有15—20吨大木船六条，4—5吨小木船四条，人员扩充到六十余人。

一九四六年二月，杨祖彤同志带了一个参谋、一个女通讯员、一个军需主任，在孔宝根、薛德生同志陪同下，两次来邵家庄，对“八中队”的任务、体制，做了新的部署，把修理枪枝的任务划归苏北军区修枪所（设在樊南区聚永乡李祥宇庄河东李氏宗祠内）；“八中队”改为专业生产手榴弹的兵工厂，人员近百，采用连队建制，名称仍叫“苏中第八中队”。

在改变体制时，杨祖彤同志曾对“八中队”指战员讲过这样一段话：“在被缴获的伪军武器中几乎没有手榴弹，可是不少战斗最后得靠手榴弹解决。至于刚补充进来的新兵，更感到手榴弹易学好用。所以，生产手榴弹是当务之急，刻不容缓。”杨祖彤同志还说，“我们在物资和技术上是有困难的，但可以想办法克服，希望大家边学边干，从干中学，从

学中干。”最后杨祖彤同志特别告诫大家：“这个兵工厂，必须切实做好保密工作。如果情况变化，需要转移，不要留下痕迹，以减少群众损失。”杨祖彤同志的讲话，使大家深受鼓舞，同时又感到任务艰巨而又光荣。

改建后的“八中队”是一个加强连的编制，有两个排五个直属班，即一排、二排和一班到五班。一排负责全中队通讯、运输、生活供给、医疗以及安全保卫等。二排负责采购各种原料包括杉木、杨树、焦炭（往往以木炭代用）、紫口铁（多用废钢铁）、硫磺、快硝（原用土硝）、雷管、导火线（包括手勾圈圈）、铆钉、生漆和成品手榴弹外运。直属班的任务，一班负责杨树开锯、用脚踏车旋弹柄弹盖和制作装手榴弹的木箱。二班负责平整砂子（每箱可放两对四只弹壳的模型），准备铁水浇铸以及浇铸后弹壳上的灰渣清理。三班负责大炉的整修、清理、装卸、铁水浇铸和以杉木烧焖木炭。四班负责碾细木炭，拌和焙炼的硫磺，制作药饼，晒干碾碎，加入土硝（后改用快硝，装弹壳时方放入），制成炸药。五班负责弹壳、弹柄、弹盖的刷漆。在木柄里圈导火线，安雷管，然后把线圈封压在柄口里，塞紧弹盖。把炸药装入铁壳内，用铆钉铆紧，连接壳柄，组合成成品手榴弹，装箱待运。

手榴弹制成装箱后，通常由部队派人来运，有时由部队运送到邵伯苏中四团，有时运往高邮龙奔转交界首、临泽和永安的关河桥转运兴化大邹庄、茅山等地。有一次，敌人得悉我军有一批手榴弹经永安以西小金沟大河运到关河，便从樊川、小纪调来一个连的兵力，企图伏击夺取。我方侦察到这一情况后，将计就计，一面派几条运杂树的船由小金沟缓缓通过，拖延敌人盘查的时间；一面派一个加强非化装成敌

人，从东面袭击永安大悲寺，一枪未发，即全部俘获指挥所里的敌人。小金沟敌人得悉大悲寺失守，便从永安北线陈夏庄狼狽回窜樊川。我们放过敌人前队，歼灭敌人后队三十余人。敌人挫败后丧魂失魄，再也不敢西犯了。从此，运送手榴弹的船经过小金沟，畅通无阻，安全到达目的地。

手榴弹的生产，虽有时因原料供应不上而停工，但每月总有两三批成品出厂，每批千枚左右，仅半年时间，共生产十余万枚。

在生产手榴弹过程中，难免不出事故，开始用土硝，未发生问题，但手榴弹爆炸慢，对战斗有影响。后改用快硝，爆炸快，出过一次事故。一天下午，一个组装手榴弹的战士，装药不慎，引起爆炸，把邵万隆家三间茅屋掀起几丈高，战士们就地滚开，炸伤四个战士和女房东大毛子（此人尚在）。当即把五个伤员送往设在樊南区聚永乡葛家庄的“苏中后方医院”治疗。区公所并决定由孔宝根同志负责，拆掉西明寺三间倾斜欲倒的偏殿，为邵万隆家重砌了三间房屋。此后，群众更信任新四军了。

这个兵工厂有三个特点：第一、工具简单，生产过程全部人工操作。没有一台鼓风机，靠人工拉风箱。第二、生产组合既固定又流动，既集中又分散。如木炭是用从寺庙庵堂拆下来的木料就地烧焖。收购的杨树，一部分就地开锯，在船上车旋弹柄。开大炉铸造弹壳，有时在永裕乡的姜石庄，有时在樊南区聚永乡的李祥宇庄，但大多数在邵家庄内生产。制造炸药和总装也没有离开过这一基地。第三、该厂部队编制，既是战士，又是制造手榴弹的工人，能打仗，能生产，还配合地方工作。

兵工厂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严密，十条大小木船，通常

有两三条停靠河边，没有运输任务的时候，均分散停泊在邻近河沟中。各班生产均在群众屋内，开大炉时，声浪较大，为了遮人耳目，便在室外陈列了一些犁头犁花，给人以生产农具的假象。在保密工作中，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：邵家庄有一个叫邵万栋（绰号王鱼子）的，在永安镇设摊卖油和茶食，是易于泄露手榴弹厂的“电线杆子”，决定由孔宝根同志查处。孔宝根同志与陈庆桐中队长商量，分析邵万栋家庭经济不宽，本质是好的，在永安受人欺压。但此人胆小怕事，可能经不起敌人威胁利诱，有暴露军机的危险，不过邵万栋以前没有泄露过这里的情况。于是请示区委，找邵万栋谈话，交待政策。指出他可以在永安继续设摊，如因敌人找他查问“八中队”情况，以致遭受损失，由区公所赔偿。如能及时向“八中队”报告敌人的活动情况，我们尤表欢迎。但若泄露“八中队”秘密，后果就由他负责。后来邵万栋成为我们安插在永安的侦察员，不断向我们提供有益的情报，为我们掌握敌人动向起了一定作用。

兵工厂十分注意搞好军民关系。每天为住户扫地、挑水。平时经常有同志出去串门，访贫问苦，修理茅屋。对特别困难的群众，分别赠送粮食、寒衣，损坏群众的东西，照价赔偿，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。军爱民，民拥军，许多群众帮助战士补衣做鞋，有的还协助站岗放哨。有一次，群众邵万喜从永安回来，向部队报告伪军下乡，在谈家桥群众家里抓鸡抬猪。部队随即派出两个班，经徐马桥到朱阿房，鸣枪出击，迫使伪军逃回永安，保护了群众财产。

兵工厂的一切供给都按部队标准，吃的是大灶伙食，开大炉的吃中灶，每月津贴二斤猪肉，四两黄烟，别无其他福利。生产手榴弹很劳累，大部分同志都能胸怀革命大志，以

苦为乐，以苦为荣，但也有个别战士吃不了这个苦，思想动摇。如有个战士李阿福开小差逃跑，被地方武装抓住押送“八中队”。部队有些同志认为李的逃跑，不仅影响士气，而且如被敌人抓去，破坏性很大，主张处决。可是陈庆桐中队长认为处决办法不妥，主张弄清思想，提高阶级觉悟，促其认识错误，改正错误。后来陈队长找李阿福促膝谈心，了解李阿福逃跑的原因是：李为一家群众挑水时跌了一个筋斗，摔断了扁担，跌坏了水桶，还打破了一只缸，而他一个月的津贴费不够赔偿；加上开大炉，火星烧坏衣服无人缝补，因而不愿再吃这个苦，准备逃回家去做长工。陈队长了解他逃跑的原因后，指出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重大意义，严肃地批评他逃跑的严重错误，并用他的苦难家史启发他的阶级觉悟，还表扬他损坏群众东西用自己的津贴费赔偿的事迹。至于津贴费不够赔偿的部分，由部队补足。开大炉衣服容易损坏，这是个实际问题，苏中区已决定每人增发一套衣服。陈中队长语重心长的谈话，使李阿福深深认识自己的错误，并沉痛地表示悔改的决心。李阿福回到班里，作了深刻检讨，得到同志们的谅解。以后他各方面表现很好，受到上级表扬。北撤时，在邵伯阻击战中，为掩护同志撤退，光荣地牺牲了。

“八中队”队部设在我家，当时我才十四岁，读过几年私塾，后来由于战争原因失学，“八中队”的同志都叫我小鬼。我经常闹着要当新四军，陈庆桐中队长说我年龄小，安慰我总有一天会吸收我入伍。一九四六年四月三十日，陈队长带我去邵伯特别市取拉火线时，经杨礼彬市长口头同意我为“八中队”一名最小的战士，一切供给和其他队员相同，就是有一样与众不同，要在群众中保持灰色身份。以后，我单独送信，也和一些同志去丁伙、三周庄运过硫磺。八月下

旬，敌人由仙女庙经陈家甸侵占乔墅，并控制乔墅西北方向的北摆渡，企图包抄邵伯。在这恶劣情况下，我由两个同志掩护，越过敌人封锁线，去邵伯取回五、六公斤导火线、雷管，保证兵工厂生产的需要。

一九四六年十月五日，邵伯第三次保卫战打响丁，手榴弹生产任务更加繁忙，往往来不及刷漆就装箱运走。可是九月上旬，又一批手榴弹突击装配完成后，各班、排都忙于清理生产现场，不留下丝毫生产手榴弹的痕迹。我猜测到这是撤退而不是一般的调防，便要求陈队长把我带走，陈说对我已有安排。这时薛德生同志带文书王杰同志来找我谈话，说形势急剧变化，“八中队”马上撤往兴化周庄。因我年龄太小，尚不能独立生活，经与王正甫同志商量，要我当区里的地下交通员。

“八中队”撤走二十余天，我军全部北撤了。阴历十月初三，国民党还乡团陆康侯、李跃宽（均被镇压）来邵家庄抓走区委孙来吉、沈××两同志，十月初六，两同志均在滨湖陆庄庙光荣牺牲，但还乡团始终不知道邵家庄曾设过手榴弹兵工厂。